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科技军事卷

辽海出版社

军事思想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科技军事卷 •

军事思想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概述

满清王朝依靠武力消灭了明朝，建立起了全国统一政权。但在军事思想方面，清王朝的贡献却是很微小的。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在军事上并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特别是清朝是游牧部落起家，一直坚持“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的思想，对军事技术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以及军事学术发展，漠不关心。清初，火器发明家戴梓制成了一种可连扳连射28发子弹的连珠铳。可是，清政府只是将其用于玩赏，而看不到它在军事上的意义。因此，尽管到清代中叶，军队的火器数量已占到兵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火器的技术水平却并无多大提高，军事思想则更无大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以武力得天下的王朝，往往陶醉于已有的武功，满足于祖先的军事成就，而不重视军事的新发展，以致陷于保守落后状态。

从清代前期的军事著作来看，虽然清王朝对兵书较为重视（如清初撰修的《明史·艺文志》将兵书类提到第五位，乾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又把兵书类的地位提高到第二位，列在儒家之后，认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但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特别是对明代兵书的查禁很严，从而使得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思想内容上创新不多，不少军事著作仅仅停留在对以前兵书的辑录上，“述而不作”，这也是清代前期在军事思想方面发展缓慢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类兵书有《乾坤大略》、《泚澥百金方》、《治平胜算全书》等。

清代前期的兵书在数量上还是不少的。据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著录，清代前期兵书有101部共690多卷。但这些兵书在思想内容上无大的创新。当然，这一时期的兵书也有一些

特点。例如，有些兵书通过分门别类地辑录历代兵书，力图探寻出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同时，军事地理方面的著作有了发展，出现了像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这样著名的军事著作。

清代前期主要兵书

1. 《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作者王余佑（1615—1684），字介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人。明朝末，王余佑曾在家乡组织地主武装抵抗农民军。清军入关后，其父、兄被清朝杀害，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此后，他隐居于易州五公山，从事著述，《乾坤大略》即著于此时。全书共10卷，约6万字。王余佑著这部兵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或后世起兵反清者提供作战理论和历史经验，即为了“致中兴，赞大业”而“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乾坤大略》就是他拟定的以武装斗争夺取清政权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作者以《武备志·战略考》为基本资料，按类分篇，以篇为卷，每卷之前有序言。在各卷的序言中，论述了兵起先知所向，兵进必有奇道、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攻取必于要害、据守必审形胜、立图在有规模、兵聚须资屯田、克敌在刃欲速等战略原则，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余佑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速战速决的进攻思想。王余佑主张进攻。他认为战争只要爆发，就不能单纯的进行防御，而应该积极进攻，攻城略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他说：“兵已起矣，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是说，快速行动就能获得有利的战机。这种“贵疾速”的思想是孙武“兵贵胜，不贵久”思想在清初的继承和发展。

(2) 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王余佑对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十分重视。他认为战争的行动是极其快速的，在极短的时间内，战争的胜败就见分晓。因此，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他说：“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此之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正确的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必须以正确判断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为客观根据。他说：“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如果敌人兵力弱小，就向其腹心进攻；如敌人兵力强大，就“断宜傍翦其支”。要能做到这一点，王余佑主张“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他说：“剪其支者云何？曰避实而击虚也，乘势而趋利也。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这就是说，战略行动上如能“避实击虚”、“乘势趋利”，就能使敌人猝不及防，使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他还提出在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时要把握好时机，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3) “兵起遇敌，决战为上”的思想。王余佑认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他的理由是：当我方进攻到敌国内地时，敌方必要“并力倾国”，集中全力与我进行殊死决战，“以图蹂荡我气，恐我声势之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方不进行积极的决战，一旦为敌所乘，便会“鱼散鸟惊，无可救矣”。只有进行决战，“出其不意，才能鼓舞士气，取得战争胜利。他说：“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至于进行决战的方法，他主张出奇设伏。由此可见，王余佑坚持的是战略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他把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看成是根本“大略”，至于无关大局的某一暂时的胜负，某一局部的强弱，在他看来，“又何足云”！正因如此，他以《乾坤大略》命书名。

2. 《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旧题惠麓酒民编。全书共14卷，约14万

字，另外有各种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图 175 幅。“泝澣”取自《庄子·逍遥游》，以防手龟裂比喻国家防御问题。全书主要从《左传》、《周礼》、《二十一史》等书中，分类辑录历代攻防作战原则、方法，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加以评论，基本上是一部汇辑评论历代防御战例的兵书。其防御战备战法主要有：

(1) “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泝澣百金方》认为战争的爆发有时是很偶然的，要保证国家的安全，防止国家遭受外敌的侵略或干扰，在平时一定要加强防备，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因此，它提出在太平之世，在人们思想上，应该“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不能产生和平麻痹思想。

(2) 防御的一般原则。从“安不忘危”的备战思想出发，《泝澣百金方》认为要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在指导思想上应该做到：第一，“固结民心”。第二，加强军事训练。它主张练兵和兵民结合。练兵要以“训兵六章”，即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为准则，以练心、练艺、练胆为主要内容，实行兵民联合防御。第三，做好物力上的准备。它认为防御作战必须以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它说：“积贮为天下之大命”，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无法进行防御的。要保证物质上的准备，它提出“公督私藏”、“藏富于民”。同时，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造，认为器械不利，势必要“以其卒与敌”这一思想应该说来源于《管子》。第四，“以战为守”。它认为在作好防御的基础上，“善守如环”，没有任何漏洞，这样就可以主动地进攻敌人。进攻敌人的方法有“天降”，即从云梯上由高处进攻；“地出”，从地道出击；“近冲”、“远击”等。第五，“扼险者胜”。防御战和地形的关系十分密切。《泝澣百金方》认为要能取得防御战的胜利，必须正确地利用地形。它主张“扼险”，即把握住险要地形，反对“恃险”，即片面依靠有利地形。他说：“扼险者胜，恃险者亡。”这种既重视利用有利地形，又反对片

面依靠有利地形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3. 《治平胜算全书》

《治平胜算全书》为清前期名将年羹尧所编。全书共12卷，约15万字，阵图、兵器图455幅，主要是分类辑录了《孙子》、《太白阴经》、《虎铃经》等清以前的兵书中的论述，在辑录的基础上，对战场选择、治军、兵器使用、城池攻守、火攻水战等问题作了评述，体现了年羹尧的军事思想。其主要思想有：

(1) 重视军队训练。年羹尧极其重视平时对军容、军纪、军威、士气、号令等方面的训练。他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平时的训练养成的，“平时训齐”，到了战时就能行动一致。在训练时，他主张培养士气，有了高昂的士气，军队必然显得威武雄壮。所以他说“无事在选在练，有事在鼓其气”。怎样才能“鼓其气”呢？他提出在军队出征前，应让将士层层“结状”，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使其增强“进死而荣”、“退生而辱”的观念，这样便能在作战中勇敢奋战。

(2) 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在作战指导方面，年羹尧基本上继承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注意对敌情的了解。他了解敌情的思想与《孙子》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对士俗的调查，使得了解敌情的范围有了扩大。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趋利避害”，这样便能百战百胜。

(3) 重视占领有利地形的思想。年羹尧提出应该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即“先居胜地”，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4) 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年羹尧对攻城和守城的看法上。他认为守城作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兵强粮足，城高池深”情况下进行的守城作战；一种是在相反情况下。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守城作战的方法就不能相同。在攻城作战中也应如此，他提出根据兵力的强弱、

众寡不同情况，可采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的方法，不能不看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一种方法。除上述以外，年羹尧对夜战、水战、火战以及火器、地雷的配备、使用等都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思想都是他作战经验的理论总结。

4. 《将略要论》

《将略要论》，旧题刘连城著。全书只有 400 余字，但它是刘连城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全书虽字少但内容还是较深刻的，正如刘连城的友人所说：“篇首以守静明公四字论为将之道，乃探源在战守之先；……中以人和察天时审地利于将战之际；……后以兵民之总在和，能相济为要。”可见，书中主要论述了为将之道，战守之宜和兵民关系三个问题。

(1) 关于“为将之道”。刘连城提出“定”、“得人”、“知人”、“用人”、“爱人”的思想。他说：“夫为将之道，首在定。定则静，静则明，明则公，公而无私，克私不犯，则进退矣。”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首先必须做到坚定，这样就能静，做到了静便能明辨是非，主持公道，不谋私利。同时，还要“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总之，在刘连城看来，一个真正“能受国家之重任，终能立绝代之功勋”的将领，必须能“省天时之机，察地利之要，揽人和之济，详安危之变，知定乱之法，久而不倦，遇事不乱”。但刘连城认为“走”即可“明”、可“公”，却并非至论。

(2) 关于战守之宜。刘连城认为战争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对待战争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不可“贪战”。他说：“安危之变，微乎其微；定乱之法，慎乎其慎。安危定乱，良在守微，守微者兴邦之基也。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侦审敌情，有机必战”，战胜了便“不可夺”；如无有利战机，便进行防守，“无机固守，守不可摇”。所以说：“所贵乎守，则有条；战则有

节，战守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邦矣。”

(3) 关于兵民关系，刘连城认为“民为兵之源”，人民是军队力量的源泉。他从军队的“粮饷皆出于民”讲起，认识到“兵无民不坚”。因此，如果人民的生活不安定，“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因此，军队要爱护人民，“珍之爱之”，保卫国家，“兵为邦捍”。其次，他认为“兵为民之卫”，军队是人民的保卫者。刘连城提出：“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获，皆籍于兵。”因此，“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作为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应该慎重和尊重。特别是那些为官者必须教育人民，使人民知道军队的辛苦，而军队的将领则应教育士兵们了解人民的艰苦，使“兵民相洽，倚民养兵，倚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这就是“安危定乱，全生全国之根也。”刘连城对兵民关系的论述是较深刻的。故《将略要论》虽文字短少，但思想较深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5. 《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汪绂（1692—1759）汇辑。全书共10卷（卷6上，卷10已佚），地图41幅，星图、八卦图33幅，阵图53幅，约23万余字。全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类汇辑了有关兵书和要图，并加以评论。前3卷录述周天太极、云雨风角等。中3卷为舆图、疆域形势、水陆路程。其中《天下形势总论》与《天下形势分论》具有兵要地志性质，论述全国山川形势及各地战略地位、相互关系。指出：雍（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等地区）居中原之首，冀（今河北南部及河南等地区）居中原之脊，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为天下之要膂。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济，居洛则重雍，居吴则重荆、襄。此外，还具体论述了燕京（今北京）、长安（西安）、洛阳、南京、成都等地的战略地位及设防，对军事地理学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后4卷编辑和评论清以前的一些兵书、历代阵法、兵器。其评论用兵之道以仁义为本，首推司马穰苴，次吴起，再次孙子，反映了编者的儒家思想。对古阵法名称、阵容结构、阵内各部位的变化、运用，都加以说明，描绘成图。还综合古阵法，提出一些阵列，如综合三叠、连环、鸳鸯等阵之长，创五叠连环阵，等等。另外，对水战、山战的一些阵法也作了评述。

6. 《兵迹》

《兵迹》，旧题清魏禧（1624—1681）所著。全书分12编。第一，历代编。论述清以前历代的军事发展情况。他认为：“太古之世，民物友处，无有蚩伤之心，迨后机智渐生，茹血衣皮，兽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剥材木以相拒。”这样便产生了战争。他在论述春秋时的军事时说：“师以义动者胜，耻为城下盟。”另外，又分列列国编，对春秋时期各大国的军事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还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在军事上的不同，认为前者是“有相无将”，后者是“有将无相”。第二，将体编。主要通过将领自身的姓、名、身、志、歌、笑等说明在军事中的利用和作用。例如，利用姓的相同，可以“因姓用计”；也可以利用名声，威慑敌人，“威武素著，则声名足以慑也，有呼其名而退敌者。”第三，将兽编。主要论述了一些动物在战争中的利用。第四，将能编。主要论述了将领的能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提出在攻守上，“有先攻以为守者”。又说：“兵凶战危，不可不慎”；“谋画先定，战必收功”。在谈到将领“诚”时说：“兵以诈胜，无谋非用兵也。”说明将领的“诚”和“诈”是统一的，对己要诚，对敌要诈。第五，将效编。主要论述将领所应效法的问题。例如，在陷坚条下，说：“善战者莫不贵冲虚、乘弱”。在断归条下，说：“何以得三军死战，惟有断归路一法耳。”在败条下又说：“善败者不亡。胜败兵家之常，故败不足畏，要在能持败而取胜耳。”说明了如何转败为胜的问题。第六，华境编。分析了全国

各地的地理环境、民众、士兵特点。如，西境，认为西部地区的民众和士兵“心强气褊，骁健信邪，苟托神奇怪异”。而“川兵心泼气雄；服劳耐苦，涉险甚健有胆力。”第七，华人编。论述了全国兵员情况。第八，土夷编。分析了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九，岛夷编。分析了全国的岛屿情况。第十，近国编。论述了我国近境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第十一，远邦编。分析了国际各国的情况。第十二，边塞编。分析了我边境的交通要道状况。全书的每一编都分别概括出了几个字，以这几个字为纲，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论述。因此，《兵迹》不单纯是一部汇编其他兵书的军事著作，而是有自己的体例和思想，内容也较广泛。但此书是否是魏禧的著作，还有待研究。

7. 《读史方輿纪要》

《读史方輿纪要》，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辑著。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明亡，隐居不仕，积二十年心血，“以史为主，以志证之”，根据正史、地方志、旁及野史，并结合山川考察，撰成是书。全书共130卷，輿地要图36幅、沿革表35份，约280多万字，是清初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

关于编著该书的目的，顾祖禹说：“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见，他不是为研究地理而研究地理，目的在于考察“山川险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战略地理学”性质。从这一点出发，他首先认为地理形势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君主还是宰相，都应该对国家所处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不知也。”只有在正确认识地理形势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制定军事战略。但是，他并没有把

地理形势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是同孙武一样，承认地理因素是“兵之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人与地理因素相比，人是根本的。因为，任何地形在人的作用下是可以变化的，“险易无常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灵活地加以运用。他还特别注意对于国家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认为国家首都对于国家的存在十分重要，加强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以明代北京为例，他主张多层设防，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御系统，从而保证首都北京的安全。

在历代州域形势部分，顾祖禹综述了明代以前各代的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举凡州域、城邑疆界、山川险要、形胜所在，都有述考。以卷一秦为例，即分别有始封、徙居、定都、四周形胜、地利等项和《战国策》、《荀子》、《史记》等史籍有关秦的论述。各省方輿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的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各部分有序、综述，然后分别叙述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城邑、山川、关隘、古迹、桥梁、驿站等。对险要之处的论述尤其详细。如居庸关，既记其位置、异名（又名军都关、纳款关、蓟门关）、四周相连属的要地；又载诸家之论，以突出其形势、地位的重要，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太行八陁，其第八陁为军都”，“路狭而险，北平咽喉”等，更详列东汉至元明间在此用兵事例。这就把地理形势、沿革、区划的历史考察同战史结合在一起，从军事的角度考察了历代地理情况。輿图要览部分，可以说是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分别说明了各省形势、山川险易、边防设施、兵员粮饷等情况，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因此，这本书被历代兵家所重视，被誉为“千古绝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后期军事思想

清代后期兵书概述

清代后期（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兵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军事学说，是中国军事学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后期兵书大致可分五类：一是包含战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等内容的综合军事理论著作；二是关于武器制造和使用的论著；三是关于国防建设的呈文或专著；四是关于军制的著作；五是各类军事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后期兵书总数在1000种以上。此外，尚有大量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

清代后期兵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近代军事特点的深刻思想反映。它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落后，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中国军事技术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传统军事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多数兵书仍是模仿明代《纪效新书》的体例，重复戚继光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思想。尽管如此，这期间的兵书仍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一是倡言新军制的著述陆续面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表明国家的经制之兵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少人转而寄希望于乡兵和团练的建设。这方面的著作有许乃钊编辑的《武备辑要续编》、王鑫的《练勇刍言》、朱孙贻的《团练事宜》等。太平军推出的《太平军目》、《太平军制》，是农民起义军军制著作，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二是有关兵器制造、设防备战的著作激增。在“制夷以利器为先”的思潮影响下，丁守存的《用地雷法》、潘廷辉的《铸炮图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纷纷出版。有关海防备战的兵书，则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林福祥的《平海

心筹》等。它们具体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防建设和备战指导思想的新趋向。

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翻译西方军事著作三四十部。天津机器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天津水师学堂也都翻译了不少西方军事著作。关于海防建设的著作则有郑观应的《易言》三十六篇。

第三阶段是甲午战争结束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清政府进行了军事改革，反映德日两国军事思想的各类操典、专著、教科书大量引进。此外，《战略学》、《军制学》、《兵学教科书》、《战法学教科书》等基础军事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人们试图在吸收外国军事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军事理论体系。1898年，徐建寅编成《兵学新书》，就是这种努力的开端。陈龙昌的《中西兵略指掌》和易熙的《中西兵法通义》等，也是这一时期的有影响的军事著作。

清代后期主要兵书

1. 《海国图志》

魏源著，是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谋划整军经武方略的兵书。魏源在“原叙”中指出，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是根据《四洲志》和其他译稿编写的，1842年初刻本只有50卷，1847年增补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魏源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并阐发了不少治军方法和战略战术原则，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思想的集中反映。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看到了中西军事方面的差距，因而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他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把了解世界形势和熟悉敌情作为抵御外侮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外国军事

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一是在广东设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外国人帮助造船、造炮和教授“行船、演炮之法”，选广东福建地区的巧匠精兵学习训练，掌握“西洋之长技”为我所用；二是建立一支用瓶式轮船装备起来的精锐水师；三是选练精兵，整顿军队，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提高战斗力。

在作战方略上，《海国图志》主张战略防御，即以守为攻，在守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争取战争的胜利。至于守的方法，魏源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军事特点和我国沿海地理形势，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英国侵略军长于海战，只能将其引入内河，加以打击。其二，“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沿海各省练好土兵，承担各自省份的防务。这两条原则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完全正确。第二条原则片面反对调外省兵丁就失之迂阔。

《海国图志》还就选将、练兵、城市防御等问题作了阐述；同时，热情歌颂了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业绩，谴责了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悲观论调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聩思想。总之，该书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精神和从战争实际出发、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军事思想。

2. 《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是与《海国图志》同时期编撰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论著，作者林福祥，1843年编成问世。《平海心筹》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以绘图贴说的形式介绍“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毒烟喷筒”等13种火器的构造、功能、制造和使用方法；下卷包括“防夷十八论”、“三元里打仗日记”、“谕林家义勇文”等。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作者抗敌御侮谋略思想的是“防夷十八论”。作者针对英国侵略者的作战特点，根

据广东沿海地形和清军的实际作战条件，并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阐述了对海上来敌作战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作战方法。

关于国家战略方针，作者提出了战、守、和三策，认为“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至于战守二策何者为先问题，作者承认能守然后能战乃兵法之常，然而，“唯今之计，则必能战而后能守”。

在具体战法方面，《平海心筹》提出了在和英军作战中应“以众击寡”、“善战上风”、“扎强营、打死仗”。作者认为，出洋作战，须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扎成一大排，四面有门户，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将小船尽藏在大排之内，……前后左右，安放大炮。打仗时，即以大排为炮台，为正兵，而小船四出，施放喷筒火箭，抄后旁击，为奇兵。”这种以多制寡、奇正相辅等作战方法，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思想。

此外，《平海心筹》还阐述了沿海作战宜用“土兵”而不宜多调“客兵”、海口炮台应建于山顶、须广招“海盗”“汉奸”以为我用，以及抚绥澳门、袭取香港等军事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多有迂阔之谈。

3. 《兵镜类编》

《兵镜类编》系以史为镜的军事类书，作者李蕊。他痛感西方列强的侵略，乃于1880—1883年间辑录春秋至明代军事史料1471条，分为68类（诸如知人、用人、选兵、练兵等等），共40卷。所辑史料全部出自正史，每条均加简短按语。其主旨在于“考古成法，变而通之”，并便于随时查考，“以资谋略”。书末附有“臆说十种”及其“补遗”，系作者以时势立论，针对西方列强一再侵扰中国沿海的形势及其船坚炮利的特点，在守城、海防、练兵、用兵、避炮、用炮等方面提出的见解和主张。提出“防水不如防陆”，避免在海上与敌作战，而将敌吸引到陆地上

歼灭。基于这种思想，作者强调加强城市和险要之处的防御，提倡多筑碉堡、地营，讲究避炮用炮之法。同时指出：“船炮水雷等项皆可恃而不可恃，最足恃者为练兵”。强调兵贵精、不贵多，练兵必先选将等等。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与近代军事学说相结合，以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新趋向。

4. 《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系湖北荆州知府徐稚荪所著，分上下两卷，1887年雕版印刷，是一部重点论述江海防建设，探讨海防作战方法的军事著作，也是继《海国图志》之后最有实用价值的一部兵书。上卷主要记述奉天至广东的海疆舆地，综述沿海沿江的地理形势。下卷则分述“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等问题。作者参考中西海防精论，阐述了加强海防、江防建设和抵抗海上来敌的方法。

关于海防布局，他认为海疆七省，以直隶、江苏为重，但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省，也不可防。沿海万余里，处处设防是不可能的，必须重点防守。奉天之旅顺，直隶之天津、北塘，山东之登州，江苏之江阴、龙华镇，浙江之定海，福建之福州、台湾，广东之广州、琼州，“均系要害之地”，应驻军严备。

关于对付海上来敌的作战方法，作者认为，外洋是敌之所长，海口亦非其所短，因而主张诱敌登陆，在陆上出奇制胜。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魏源的“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主张并不正确，而应为之续曰：“御内河不如御陆地。”为了阐发上述主张，作者在“防海说”中列举了诱敌深入、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陆战方法。

5. 《中西武备新书》